

• 特約稿 •

關於中國文學史中物質性的思考

伊維德（Wilt L. Idema）^{*}

譯者：丁涵^{**}

摘 要

近年來誕生了兩部重要的英語中國文學史：梅維恒（Victor Mair）主編的《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以及孫康宜（Kang-I Sun-Chang）、宇文所安（Stephen H. Owen）連袂主編的《劍橋中國文學史》。這兩部作品之不同結構讓我們有理由重新思索中國文學史的分期問題。大量中國文學史遵循以基於朝代的分期模式，而我認為，對文學生產和消費均產生影響的文學系統中的最根本性變遷，並非緣於政權更迭，而是因為技術變革：例如紙的發明，印刷術的傳播，近現代印刷技術的引進，以及我們當代的數字化革命。其中一些每次技術改革的最重要影響將在下文簡要探討。

關鍵詞：中國文學史分期、物質技術、機械印刷、平版印刷、紙張

^{*} 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學系講座教授/荷蘭皇家藝術科學院院士。

^{**}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博士候選人。

物質技術和中國文學史之分期

可能舉世無其它國度可以在悠久和豐贍上比肩中國而矜誇其文學史。這或能成自豪之因，但亦能為困境之源，蓋以一種便捷和具說服力的方式來綜述與呈現這個歷史絕非易事。

文學史的撰寫是新近之時尚。在歐洲其起源與浪漫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崛起密切相關，此二種主義聲稱每個民族因其自身的獨特性至少可與其它文學傳統等價，甚或較之更佳，所以每個民族皆有其獨特的文學傳統。這與數世紀前多數歐洲批評者認為的體現在古典希臘、羅馬作家著作之中的，以及後世作家僅能模仿的普適文學標準的時代形成鮮明反差。在古典主義時代，人們所需的就全在於模型與規則。浪漫主義和民族主義沖碎了普適的價值觀和模型，並代之以展開的民族傳統所帶來的靈感啟迪。民族成為了通過他們的文學來表述他們獨特身份的擴大了的作者，每一個文學傳統被每一個民族盡可能遠地回溯，並且民族文學的研究也成為每一真誠的愛國主義者的職責。¹在歐洲，因此，民族文學史的黃金時期是十九世紀。在引介浪漫主義和民族主義以及科舉考試的廢止的覺醒中，中國也接納了民族文學的概念，且自二十世紀伊始的主要學者試圖應對大學中新興中文系所需，已編纂了幾部中國文學史。當進行此事時，他們可以吸取中國原有的文學批評與書目學術的豐富傳統。對於之前被忽視的白話文學領域，胡適（關於早期白話文學），王國維（關於早期戲曲）和魯迅（關於傳統小說）的著作迅速成為了那些領域的大師級敘述。到二十世紀中期一個準則已經出現，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受制於嚴格的政府管制。這個準則仍清晰反映了中國文學作為學科確立自身的那數年環境。例如，當這個準則包括了白話文戲劇和小說時，它摒除了帝國後期的豐富多彩的俗文學；儘管女性運動幾近全盤忽略了女性文學，且忽視了道藏、佛藏中的文學性材料。近幾十年已經看到大量銳意革新的中國文學史的產出，其中一些已經被英譯。近幾年來也見到開列中國文學史領域和評估中國文學最有影響的歷史學者卓越貢獻的清單的諸多刊物。尤其在現當代中國文學的領域內，近年來也已見證了重寫中國文學史的反復號召。

依靠對在中國撰寫的中國文學史的翻譯，英語讀者也能查閱由西方學者所寫的中國文學史。事實上，由翟理思²（Herbert Giles, 1845-1935）所著的第一部英語中國文學史

¹ 有關十九世紀歐洲的民族主義與民族語文學關係的論述，參看約普·勒森（Joep Leerssen）：《歐洲民族思想：一部文化史》（*National Thought in Europe: A Cultural History*）（修訂版，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大學出版社，2008），頁 173-218。

² 翟理思（Herbert Giles）：《中國文學史》（*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1901 年。

至少不晚於中國最早的同類論著。³而中國作者用漢語書寫的中國文學史預設的讀者是中國人。這些作者被容許期待他們的讀者會對中國歷史和文化有著廣泛的瞭解，且因此對他們著作的直譯並不必然成為為西方讀者介紹中國文學的最適切的形式。最新的英譯中國學術作品已被全面地重寫以應對不同的學術話語和適合西方讀者不同文化的期待。是故存在一個對中國文學史的需求（若僅針對我們那些在中國之外的院校語境中的教授中國文學者而言），也即這個文學史是考慮西方讀者並會包括有關中國歷史和文化的足夠背景，以使得中國文學史的發展沿革對於非漢語讀者而言是富有意義和趣味的。即便如此，由翟理思（Herbert Giles）1901年的《中國文學史》（*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在五十多年中一直無可匹敵。當哈佛大學的中國文學教授海陶瑋（James Robert Hightower）於1949年發表其《中國文學中的論題》（*Topics in Chinese Literature*）一書時，他在序中直言不諱地說：「現有寥寥可數的用西文進行的關於純文學論題的研究論文幾無可用之處。」⁴

美國對中國的全方位研究在二戰後顯著發展。對比歐洲漢學傳統對中國文化的全面研究），⁵美國的中國研究散佈在社會科學與人文系之中；同時也設立了中國語言文學系（或東亞語言文學系）。這樣，加之大量擁有文學專長的中國學者的湧入，極大地促進了中國文學自身的研究，而且許多大學課程被設計成教授中國文學（用英譯形式）。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出現了三部均由身在美國的中國學者撰寫的英語中國文學史。陳綏頤（Ch'en Shou-yi）在1961年發表了他的《中國文學史述》（*Chinese Literature: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賴明（Lai Ming）在1964年發表了他的《中國文學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柳無忌（Liu Wu-chi）接著在1968年以他的《中國文學導論》（*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Literature*）出版。⁶不過因前面兩部著作水平低劣以及第三部著作規模過於狹小，學者們自此一直疾呼一部更廣博的中國文學史的出現。從二十一世紀始我們現已有兩部這樣全面地中國文學史。其中第一部由梅維恒（Victor Mair）主編的《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在

³ 最早的西文中國文學史是用俄文撰寫的。然而西方著述並未對第一代中國文學史家產生影響，日語著述卻反之。日本學者早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便已書寫日本文學史而且很快編撰出中國文學史。他們所著之中國文學史起初即已涵蓋中國戲劇和白話小說。

⁴ 海陶瑋（James Robert Hightower）：《中國文學中的論題：提綱和書目》（*Topics in Chinese Literature: Outlines and Bibliographies*）（修訂版，馬薩諸塞坎布裡奇：哈佛大學出版社，1965），頁vii。

⁵ 在歐洲直至十二世紀中期的學術性漢學主流領域是歷史與古代哲學。

⁶ 同樣這十年也可見白芝（Cyril Birch）主編的《從早期至第十四世紀中國文學選集》（*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early times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紐約：叢樹出版社，1965），幾十年來成為經過翻譯最廣被使用的中國文學選集。第二部《從第十四世紀至今中國文學選集》（*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Volume 2 from the 14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day*）由同一家出版社於1972年刊行。

2001 年問世，⁷第二部是由孫康宜（Kang-I Sun）和宇文所安（Stephen Owen）連袂主編的二卷本《劍橋中國文學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則在 2010 年問世。⁸我榮幸地都參與了這些項目。這兩部新著凸顯出了與那些六十年代的三部舊著的一個主要差異：前三部舊著都係個人所撰，而這兩部新著均為集多人合編之作。⁹

這兩部新的英語中國文學史的編者們自然會面臨他們的中國同行同樣的問題：如何以系統性的方式呈現構成中國文學史的浩瀚材料。《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的主編梅維恒，選擇了主要採用體裁（詩歌，散文，小說，戲劇，批評和大眾文學）分類，不過卻以命名為「基礎」的一部份作為起始。這一部份不僅處理了先秦文學的多個方面，而且還涉及了諸如「超自然」，「智慧與幽默」，「諺語」，「佛教文學」，「道教遺產」和「女性文學」的主題。在專注於獨個體裁的部份內，那些章節有時是按子體裁來編排，有時則按時期來編排。這之中的一些時期起訖甚短，且不必然與固有的中國分期相交疊；被用為一個體裁的時期也不必然適用於其它體裁。例如，針對帝國晚期的古典詩歌，是被放置於專論每一個世紀的章節中處理的，然而明清白話文小說則被分置兩章，前一章專論六部主要小說作品，後一章專論「不太被廣為人知的作品」。在專論戲劇的部份內，我撰寫的一章含括元、明、清三朝七個世紀的傳統戲劇，而陳曉梅（Chen Xiaomei）撰寫的一章則包括了二十世紀話劇的興起和發展。為撥正《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的混亂分類，《劍橋中國文學史》的編者們選擇了基本採用編年的方式。這方面的特例是我親自撰寫的關於中國說唱文學（*prosimetric literature/chantefable literature*）一章，是被插入在商偉（Shang Wei）所撰有關「盛清文學」和王德威（David Wang）所撰

⁷ 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梅維恒之前主編過《哥倫比亞中國古代文學選集》（*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94）。最近他和馬克·本德爾（Mark Bender）共同主編了《哥倫比亞中國民間和大眾文學選集》（*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Chinese Folk and Popular Literature*）（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2010）。

⁸ 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宇文所安之前出版過《中國文學作品選：從先秦到 1911》（*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Beginnings to 1911*）（紐約：諾頓，1996）。

⁹ 一部較早集結英文為母語的中國文學學者的群體項目是由倪豪仕（William H. Nienhauser Jr.）主編的《印第安那傳統中國文學指南》（*The Indiana Compan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布魯明頓：印第安那大學出版社，1986）。這部著作由十篇介紹性論文（關於佛教文學，戲劇，小說，文學批評，詩歌，大眾文化，散文，修辭學，道教文學）組成，附有幾百篇關於個體作家和作品的條目。接著倪豪仕主編了《印第安那傳統中國文學指南》（*The Indiana Compan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第二卷（布魯明頓：印第安那大學出版社，1998）。這部著作由對第一卷中的論文和條目所新增的條目和書目構成。歐洲的群體項目催生了四卷本的《中國文學精選指南（1900-1949）》（*A Selective Guide to Chinese Literature 1900-1949*）（萊頓：布里爾出版社，1988-1990 年），分別致力於小說（由米列娜（Milena Doležalová-Velingerová）所編）、短篇小說（由普實克（Zbigniew Slupski）所編），詩歌（由漢樂逸（Lloyd Haft）所編）和戲劇（話劇：由艾伯斯坦（Bernd Eberstein）所編）。在二十一世紀的初十年裏由沃爾夫岡·顧彬（Wolfgang Kubin）領銜的一組德國漢學家推出了多卷本的《中國文學史》（*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慕尼黑：索爾出版公司，2002）。這個項目中大多數每一卷都專注於一個體裁（除了在第七卷中顧彬提供了一段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歷史）。

有關「晚清和民初文學」的章節之間。《劍橋中國文學史》中的分期法嘗試去從基於朝代框架的過度依賴中解放自身。一般地說，一個新朝代的早期時代要作前朝文學的最終總結，新事物的開端需等到更晚一些。例如，唐朝的前半世紀看起來以南北朝文學高潮而言更說得通；宋朝第一代見證了主要的唐朝文學總集諸如《文苑英華》，《太平御覽》和《太平廣記》的編纂；而清朝第一代很大程度上是晚明文學的延續。

有許多人——我是其中之一——是對將朝代框架適用於中國文學史分期深感不安的。無人想要否認它在中國的實用教學價值。但是如有人像我一樣認為中國歷史中的變化遷移之快一如世界上其它地方，總計達三百年的時期將會有一些內在的統一性以使其襯托於其它與之相對等長的時期是很難想像的。若果我們將明朝的概念適用於英格蘭，則它從黑死病延展至（幾乎）查爾斯二世的處死，包括了文藝復興和基督教改革運動，以及從歐洲至美洲、印度和遠東的海航線路的發現。這也不是欲否認政治能對文學產生的影響。二十世紀的中葉已經殘酷地給我們呈現當中國政府決意全方面控制從生產到傳播的文學生活時會發生些什麼。在前現代中的政府控制想必會更時斷時續，但前現代的中國政府也更能讓他們真正憎惡一個文本時而將其毀滅——在其它時代的禁限（色情和淫穢材料的）可能僅僅是暫時的且大多是用來提高所涉書名的價格。當然也有許多可能會影響作家及其文學創作的文化，經濟，社會和制度政策的方面。所有這些都值得研究，不過有人可能會懷疑在何種程度上這些是文學變遷的最基礎的方面。

若有人願意接受文學史分期的長時間段，則我確信在物質條件中的文學生產與消費變遷較之政治移變更為基礎重要。正如許多人業已指出，在數字化革命中我們正在經歷一個可以預見文學書寫，傳播和消費方式發生劇變的時代。我們將不僅在網絡上擁有文學，而且這個網路文學將利用我們的電子傳媒獨特的可能性來創造前所未見的文學載體。如果文學史不僅是往昔名著的編目而是文學交流發展的歷史，¹⁰我們必須要將這個交流過程的各個方面納入考量。沒有一個交流過程的方面比物質方面更為基礎。我確信在早期中國文學史中我們也可精準定位出技術革新極大地影響作為一個社會系統的中國文學和所創作品的那些時刻。

在歐洲文學的研究中，印刷術的出現總是被譽為一個分水嶺，並且手抄本時代中的文學生活與印刷時代在文學的生產和消費上有著本質差異是被廣泛認知的。在中國領域內近幾年也見到了印刷文化的研究發展和手抄本文化研究的相對發展。不過在我看來仍只有為數不多的人在研究歐洲印刷術的影響時適用同樣的意義來研究在中國語境中的印刷術之發明與傳播。這由諸多原因所致。第一，歐洲印刷術的影響是突然的，迅疾的和廣泛流傳的。當翰尼斯·古騰堡（Johannes Gutenberg）完善他的鉛字設定和印刷出版的體

¹⁰ 參閱阿蘭·威能（Alain Vaillant）：《文學史》（*L'Histoire littéraire*）（巴黎：阿爾芒科蘭，2010）。

系時，幾十年內這個技術便已遍及歐洲。¹¹在中國案例中雕版印刷技術緩慢地完成甚至更遲地被採用，並且雕版印刷的發明與傳播的記載非常薄弱。¹²現在看來學者們均同意直到第七世紀末中國雕版印刷的所有元素已都完備。這看起來在初期這個技術主要被用於複製簡單的佛教材料，且僅僅緩慢地被應用於印刷完整的書籍。今存最早的印刷書籍是在敦煌被發現的 868 年的《金剛經》（*Diamond Sutra*）。¹³這本絕佳的印書書讓人們只能困惑為何這套程序在當時未被廣泛採用，卻直到十世紀中期儒家經典被印刷出來。眾所周知，宋朝資助了多項出版工程，到十一世紀中期各種材料被政府機構，私人個體和商行書林熱火朝天地進行印刷。那就意味了從十一世紀中期開始，當時幾乎所有手抄遺產的總量不僅在帝國藏書館中的手抄本中可以見到，而且在都城及其之外的官僚和文人的印刷收藏中。¹⁴

不過疑問隨之而來，為何歷經如許多世紀印刷方才成為生活的一部份？原因之一，我認為在歐洲印刷術的引介是被伴隨著紙張的引介的。古騰堡仍在用一種由牛犢與羊的皮精製而成的皮紙來印刷他的《聖經》，這種皮紙成為貫穿歐洲中世紀手抄本的普遍載體。既然每件手抄本都是抄工耗力書寫的珍貴商品，皮紙的生產明顯能夠跟上需求。但歐洲的印刷品很快轉變為紙張，這又一件中國的發明，因為紙張更廉價也容易使用許多。而到十一世紀中期紙張在中國已被廣為使用了千年，中國的造紙者已學會利用各種纖維，如用竹來製成更輕薄價廉的紙張。我們後面將探討紙張的發明應用之寓意，但此處我想提出紙張作為一種高效價廉的書寫材料的普及性可能與印刷術在中國的快速傳播

¹¹ 對於歐洲印刷術的發明之影響的研究，參看伊麗莎白·愛森斯坦（Elizabeth L. Eisenstein）：《歐洲早期印刷革命》（*The Printing Revolu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1983）；費夫賀（Lucien Febvre）、馬爾坦（Henri-Jean Martin）：《印刷書的誕生：印刷術的影響 1450-1800》（*The Coming of the Book: The Impact of Printing 1450-1800*）（倫敦，Verso 出版公司，1990）；安德魯·帕蒂奇（Andrew Pettegree）：《文藝復興時期的書》（*The Book in the Renaissance*）（紐黑文：耶魯大學出版社，2010）。

¹² 這種鐵的事實的缺乏在巴瑞特（T.H. Barrett）：《發現印刷術的女子》（*The Woman who Discovered Printing*）（紐黑文：耶魯大學出版社，2008）中非常清楚。不僅和在歐洲記載更完善的情況相比，而且和江戶日本的情況相比，關於印刷術和印刷文化的歷史資源之缺乏是顯而易見的。見彼得·科爾尼基（Peter Kornicki）：《在日本的書籍：從起始到第十九世紀的文化史》（*The Book in Japan: A Cultural History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萊頓：布里爾出版社，1998）。

¹³ 吳芳思（Frances Wood）、馬克·巴納德（Mark Barnard）：《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世界上最早有日期記載的印刷書》（*The Diamond Sutra: The Story of the World's Earliest Dated Printed Book*）（倫敦：大英圖書館，2010）。

¹⁴ 見李約瑟（Joseph Needham）編：《中國之科學與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卷 5，錢存訓（Tsuen-hsüan Tsien）著：《化學與相關技術第 1 部份：紙張與印刷術》（*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 Part I: Paper and Printing*）（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1985）。印刷術的引介不僅使得先前存在的文本更加廣泛可得，而且還修正了當早期編者可能選擇「最佳」讀本而嚴重忽略在他們處置手抄本中出現的許多衍生本。對於此怎樣影響陶淵明著作及我們對他的理解之探討，見田曉菲（Xiaofei Tian）：《塵几錄：陶潛與手抄本文化》（*Tao Yuanming and Manuscript Culture: The Record of a Dusty Table*）（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出版社，2005）。

相抵觸的可能性。可以想像用毛筆在紙上比用翎毛在皮紙上書寫容易得多，而且必然已經存在大量周圍的工作清閒的書吏加速去生產手寫複製品。可能與在中國印刷術的迅疾傳播相抵觸的原因之二是牽涉了兩種印刷技術的不同經濟。在歐洲，一個印刷行的建立包括了為印刷機和金屬鉛字投入的大量初始資金支出，但鉛字和印刷機都可被用為多種不同的書目的生產。為了得到投資回報，歐洲的印刷商想要盡可能印多種不同的書籍，而且愈多用同樣固有的鉛字和印刷機出版（和銷售），他的初始投資收益就愈豐厚。中國的雕版印刷技術不需要大量初始資金投入。誠然木材價格不菲，且刻版工是按勞獲酬的專業手工藝者，但一本書的印刷投資卻相對廉價——主要取決於該書的尺寸大小。一旦木版被刻好，如被妥善保存，當然能被周而復始地用來印刷同一本書的更多複製品，產出一連串穩定的收益。¹⁵唯一的問題是在出版每一本新書的時候同樣的初始投資必須屢次重複。傳統中國雕版印刷技術並不包含印刷商生產越來越多不同書籍的內在動力：舊有的木版能用來做該書的新複製品，但非另外的新書。¹⁶不論是何原因導致印刷術在中國的遲緩進展，我們都不能無視到十一世紀中期它已自身成立之後的影響。¹⁷例如黃庭堅的詩學和理學的發展都可被視為對琳琅滿目的傳統之易於獲得的反應例子，這一點是不得不被創造性的注引使用所承認的，或被刻意地聚焦有限的文本且排斥其它所有文本所否定的。¹⁸宋朝科舉考制度的發展若沒有數以千計的學子被給予印刷材料的可得性是無法想像的，而且文化素養想必顯著地提升了。白話娛樂文學早在十二世紀便已被印刷。有關宋至明初時間段內的印刷術的程度問題存在大量論爭，不過我更傾向比一些人更樂觀的看法，確切地是因為大多數大眾材料至少擁有倖存的幾率。有關材料有限的可得性之抱怨的攀升可能恰恰是背棄了水漲船高的預期而非供應減少。¹⁹學者們都認同在十五世紀後半段的平靜之後，印刷術在十六世紀乃至其後更為廣泛地流傳。主要原因之一是印刷式樣的簡化，緣於印刷商更青睞工體字勝過宋體字，而前者盡可能地將漢字削

¹⁵ 這與西方的情形構成反差，西方的印刷商必須決定印刷量的大小，且屆時必須盡可能地售出所有的印書品。

¹⁶ 活字於十一世紀在中國被發明並且延續使用，但大多數用在出版物的印數提前即可知道之時。在朝鮮活字被更頻繁地使用，但通常只用作印刷可以在王國其它地方用雕版來複印的少量模版。中國人在十九世紀前從不使用印刷機。

¹⁷ 賈晉珠（Lucille Chia）和威德塔（Hilde de Weerd）編：《在印刷時代的知識和文本生產：中國，900-1400》（*Knowledge and Text Production in an Age of Print: China, 900-1400*）（萊頓：布里爾出版社，2011）。

¹⁸ 關於黃庭堅的詩學發展反映了可得版本劇增的背景的研究，見王宇根（Yugen Wang）：《萬卷：在黃庭堅詩學及北宋後期的閱讀與書寫》（*Ten Thousand Scrolls: Reading and Writing in the Poetics of Huang Tingjian and the Late Northern Song*）（馬薩諸塞坎布裡奇：哈佛大學亞洲中心，2011）。

¹⁹ 周紹明（Joseph P. McDermott）：《書籍的社會史——中華帝國晚期的書籍與士人文化》（*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 Books and Literati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06）。有關從宋及後世對書籍不可獲得的抱怨不必然證明了印刷術的影響有限，可能更該被視作水漲船高的預期之象徵。

減成直線條（垂直的和水平的）：雖然簡陋但易於刻削。²⁰在清初想必對江南地區營銷奢侈讀物的出版商產生重大衝擊之時，大眾印刷還在免於干擾之下持續增長與發展。²¹

機械印刷和平版印刷

如若傳統雕版印刷術歷經數世紀方才完全體現影響，則以機械形式結合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幾乎同時引進的平版印刷的西式印刷術之影響是立竿見影和波及全國的。既非鴉片戰爭也非太平天國運動，既非 1894 至 1895 年中日甲午戰爭中國之戰敗亦非五四運動，卻是在十九世紀七十和八十年代新印刷技術的引進才迅速劇烈地改變了中國的文本生產與消費方式。²²在上海有美查（Ernest Major）的平床印刷機初以百計並速以千計發佈《申報》。報紙在全中國被蒸汽船和鐵路所傳達。報紙（且非政府舉措）的商業冒險第一次在中國歷史上創造了一個國家公共空間，在其之中新思想被位於政府之外所探討，且同時覆蓋全中國。²³其它報刊也在上海和另外的大城市中很快繼踵而來。遵循近現代印刷資本主義的邏輯，美查和其他主要出版商狂熱地以前所未有的大量數目出版新的書籍。同理適用於十九世紀最後一季甚至更後的時期內在出版擴張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印刷商們。拋開木版刻削和鉛字設置的需要；它不僅容許細緻闡釋的加入，而且還允許細小字體的使用，大大地縮減了書籍的體積和價格。

在文學與知識史中我們更傾向於關注那些能被歸為「近現代」（「modern」）一類的書籍，因為它們包含了新的理念。這些近現代書籍數年來可能變得愈發重要，還因為

²⁰ 晚明印刷工業的勃興很大集中在江南地區，因為它極大地得益於該地區的經濟繁榮。大多數此類論文載於包筠雅（Cynthia Brokaw）和周啓榮（Kai-wing Chow）編的《中華帝國晚期的印刷和書籍文化》（*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伯克萊：加州大學出版社，2005），聚焦在晚明的江南印刷文化。

²¹ 包筠雅：《文化貿易：清代至民國時期四堡的書籍交易》（*Culture in Commerce: The Sibao Book Trade in the Q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s*）（馬薩諸塞坎布裡奇：哈佛大學亞洲中心，2007）。

²² 克裡斯托弗·裡德（Christopher A. Reed）：《上海的古騰堡：中國的印刷資本主義 1876-1937》（*Gutenberg in Shanghai: Chinese Print Capitalism 1876-1937*）（檀香山：夏威夷大學出版社，2004）。也可參看包筠雅、克裡斯托弗·裡德編：《從雕版到互聯網：轉變中的中國出版和印刷文化，約 1800-2008》（*From Woodblock to the Internet: Chinese Publishing and Print Culture in Transition, ca. 1800 to 2008*）（萊頓：布里爾出版社，2010）。

²³ 關於中國新式報紙的影響，參看瓦格納（Rudolf G. Wagner）編：《加入全球公眾：1870-1910 早期中國報紙中的文字，圖像與城市》（*Joining the Global Public: Word, Image, and City in Early Chinese Newspapers 1870-1910*）（奧爾巴尼：紐約州立大學出版社，1997）。對於臨時的單張報紙的討論，參看雷維安（André Lévy）：《關於「報紙」單頁印刷品和在前現代中國時事的闡述》（*A propos des 'canards' ou feuilles occasionnelles et des illustrations d'actualité en Chinese pré-moderne*），載於其所編《中國小說和故事研究》（*Étude sur le conte et le roman chinois*）（巴黎：法蘭西遠東學院，1979），頁 57-66。

譯作數量的增長，但我們應當牢記於心的是上海的近現代印刷工業首先應那些已經存在的可證實所需而印刷書籍。《康熙字典》（Kangxi Dictionary），這個被魯迅在其著名短篇小說《祝福》（Newyear Sacrifice）中被揶揄成他的叔父守舊生活方式的象徵，僅僅在十九世紀末被平版重印時才為大多數傳統知識分子所可獲得。近現代印刷工業使舊式書籍以可能前未曾有的更大書目和更多種類來提供給大批城鄉讀者，而且這些現在便宜許多的舊式書籍將必然會對二十世紀日益增長的讀寫能力貢獻良多。一旦近現代印刷工業已確立自身，它便以技術創新的持續競爭方式迎頭趕上，且相應的投資會刺激市場的增長以便得到投資回報。以此方式上海印刷工業開創了中國近現代的群眾文學，且隨著其影響的提升，它擴大了國家使用和控制這個新現象的慾望。這個慾望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當中國大陸的印刷工業縮減為單一篇目的生產：毛澤東著作時達到了巔峰。二十世紀的政治運動只有因新的印刷文化方成為可能；以同樣方式白話文作為文學準繩的強加施行則完全取決於在上海創生的群眾文化。

紙張

印刷無論傳統或現代，均依賴紙張。在歐洲印刷術的發明與紙張的引介幾乎於十五世紀後半期重合。然而在中國，紙張卻早於印刷術發明至少五個世紀。紙張發明的傳統日期理所當然是 104 年，即宦官蔡倫向皇帝稟報紙張的發明之年，但考古學家已經發現了更早的可用紙張的樣本。在第二，三世紀過程中，當墨汁和毛筆被應用於新的材料，紙張迅速取代了絲帛竹簡而作為書寫的優先載體。絲竹都有巨大的優點。絲堅韌耐用；是圖表，地圖，繪圖和圖形優先的媒介，但絲是昂貴的——貫穿漫長的世紀裏，至少訖于唐末，絲和其他的絲織品同現金一般值價。文本在書寫于絲上之前必須得被認為是極高價值的——在個人電腦前的時期裏我們中很少有人會將他們的手稿寫在紙幣之上。由竹或木製成的簡需一些時間準備卻想必相對廉價。然而它們的缺點是體積龐大和笨重。當精英們被期待在前、後漢能夠閱讀時，書寫的體力行為可能最常見的是「刀筆之吏」（「clerks of knife and brush」）的勞動。結果只有被視作極為重要的著作才得以流通，所以從那個時期至公元 1 世紀得到流通的文章趨向於歷史或哲學的經典和重要著作，這些都是與社會秩序與帝國管理有直接聯繫的。最後幾十年竹簡大量的考古發現既豐富且多樣，但是罕有提供我們以任何文學作品。

當紙張進入普遍所用時所有這些都改變了。三世紀的作者們在他們的文章中強調他們親自書寫出了這些文章，即所謂他們在「執筆」（「holding the brush」）書寫。一旦

男女精英人物開始寫下他們自己的文本，而非教至於刀筆之吏，一手精美的書寫成為了分寫的標誌，而書法則成為了備受尊崇的一種藝術形式。現今複製變得容易，且文學創作可能變得如此流行以致於他們可能促使了紙張的提價。它不會是個偶然，我認為紙張的發明幾乎立即伴隨在專門文學（醫學、道教、佛教）的傳統和短篇個人書寫的體裁的出現之後。建安時期見證了將為中國文學輝煌近兩千年的抒情詩傳統的出現。許多學者將這種詩歌的出現與漢朝和分裂時代的崩潰相聯繫，我樂意接受這些環境可能對這些詩歌的內容造成的影響。但我深信，這種個人書寫美型的出現正是由於紙張的流傳方才使之成為可能。此方面紙張的使用與互聯網的使用看似極為相似。²⁴

結論

從骨骼與青銅上的篆刻肇端，中國之文學有從橫超過三千年的歷史。在這個悠久歷史中，我分辨出至少三個極大地影響文本書寫的生產與消費包括文學的根本性技術改變的時刻。這三個時刻是紙張的發明，印刷的普遍使用，和近現代印刷科技的引介。現今我們正經歷在互聯網及其相關數字科技傳播的第四個這種時刻。我的知識所及範圍內，考古學家尚未發現公元前 4 世紀之前的竹和木簡，且可能正是那種竹和木簡，儘管先前已知，在創造了保存戰國時期的哲學和史學著作的條件下，竟成為當時普遍書寫的一種材料。若這是真實的，則它可標誌為第五個技術突破。它也將凸顯另一個因素，也即這些技術突破促使文學的突飛猛進，縱然有社會的不穩定和淒苦的戰爭。一些其它在文學成長中的促因可能與細小的技術改變有關，例如雕版刻削程序的簡化。另一方面，印刷術發明之中及其本身並不看來成為一個在八、九世紀文學擴張的足夠導因。因為在我們所知的畛域內在唐朝文人著作（除卻白居易的那些）是幾乎不被印刷的。

文學史非一個漸次積累文本和體裁的過程。文學史包括突增，而且我深信這些突增主要緣自書寫和複製的技術改變。隨著這些突增出現了文學系統中的主要變化。在手抄本文化中作者和讀者數量寥寥。在手抄本文化中口頭交流持續扮演了主要角色。一旦我們進入全面成熟的印刷文化時代，可以看到大眾文化伴隨精英印刷文化的出現，因為學者精英讀書更多更快，僅僅文學不再充分保證其成為文化精英的一員。機械印刷，趕上了競爭激烈的現代性，為全國辯論和近現代群眾文化均創造了空間。審視了材料技術變

²⁴ 查屏球 (Zha Ping qiu)：〈紙簡替代與漢魏晉初文學新變〉（“The Substitution of Paper for Bamboo and the New Trend of Literary Development in the Han, Wei and early Jin Dynasties”），原載《中國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s in China*）第 5 期（2005），頁 153-163、207-208；又載於《中國文學研究前沿》（*The Frontier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第 1 期（2007），頁 26-49。

化之於它們現代文學系統的根本重要性，我的同事漢樂逸（Lloyd Haft）和我在 1997 年出版《中國文學指南》（*A Guide to Chinese Literature*）時所採用的基於這些技術變革的基本分期法。²⁵

現今我定不是一位宣稱在書寫與複製技術中的這些物質變革詮釋了文學史中的所有發展整體的人。當然其它因素也會牽涉其中。我們切莫忘記技術與制度因素僅僅解釋了文學系統的總體操作，它們從未能解釋個體著作的質量。

²⁵ 安娜堡：密歇根中文研究中心。

引用書目

一、近人論著

- 王宇根 (Yugen Wang) : 《萬卷：在黃庭堅詩學及北宋後期的閱讀與書寫》 (*The Thousand Scrolls: Reading and Writing in the Poetics of Huang Tingjian and the late Northern Song*) , 馬薩諸塞坎布裡奇：哈佛大學亞洲中心，2011 年。
- 瓦格納 (Rudolf G. Wangner) : 《加入全球公眾：1870-1910 早期中國報紙中的文字，圖像與城市》 (*Joining the Global Public: Word, Image, and City in Early Chinese Newspapers 1870-1910*) , 奧爾巴尼：紐約州立大學出版社，1997 年。
- 白芝 (Cyril Birch) 主編：《從早期至第十四世紀至今中國文學選集》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early times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 , 櫟樹出版社，1965 年。
- 包筠雅 (Cynthia Brokaw) 、周啟榮 (Kai-wing Chow) 合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印刷和書籍文化》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伯克萊：加州大學出版社，2005 年。
- ：《文化貿易：清代至民國時期四堡的書籍交易》 (*Culture in Commerce: The Sibao Book Trade in the Q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s*) , 馬薩諸塞坎布裡奇：哈佛大學亞洲中心，2007 年。
- 阿蘭·威能 (Alain Vaillant) : 《文學史》 (*L' Histoire litteraire*) , 巴黎：阿爾芒科蘭，2010 年。
- 吳芳思 (Frances Wood) 、馬克·巴納德 (Mark Barnard) : 《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世界上最早有日期記載的印刷書》 (*The Diamond Sutra: The Story of the World's Earliest Dated Printed Book*) , 倫敦：大英圖書館，2010 年。
- 克裡斯托佛·裡德 (Christopher A. Reed) : 《上海的古騰堡：中國的印刷資本主義 1876-1937》 (*Gutenberg in Shanghai: Chinese Print Capitalism 1876-1937*) , 檀香山：夏威夷大學出版社，2004 年。
- 周紹明 (Joseph P. McDermott) : 《書籍的社會史---中華帝國晚期的書籍與士人文化》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 Books and Literati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06 年。
- 約普·勒森 (Joep Leerssen) : 《歐洲民族思想：一部文化史》 (*National Thought in Europe: A Cultural History*) , 修訂版，阿姆斯特丹大學出版社，2008 年。

- 查屏球 (ZhaPingqui) : 《紙簡替代與漢魏晉初文學新變》 ("*The Substitution of Paper for Bamboo and the New Trend of Literary Development in the Han, Wei and early Jin Dynasties*" , 2011 年) 。
- 孫康宜 (Kang-I Sun) 、宇文所安 (Stephen Owen) 主編 : 《劍橋中國文學史》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 劍橋 : 劍橋大學出版社 , 2010 年 。
- 海陶瑋 (James Robert Hightower) : 《中國文學中的論題 : 提綱和書目》 (*Topics in Chinese Literature: Outlines and Bibliographies* , 修訂版 , 馬薩諸塞坎布裡奇 : 哈佛大學出版社 , 1965 年 。
- 梅維恒 (Victor Mair) 主編 : 《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 紐約 : 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 , 2001 年 。
- 翟理思 (Herbert Giles) : 《中國文學史》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 倫敦 : 威廉·海涅曼公司 , 1901 年 。
- 賈晉珠 (Lucille Chia) 、威德塔 (Hilde de Weerd) : 《在印刷時代的知識與文本生產 : 中國 , 900-1400》 (*knowledge and Text Production in an Age of Print: China, 900-1400*) , 萊頓 : 布里爾出版社 , 2011 年 。

Material Technology and the Periodiza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Wilt L. Idema^{*}

Translation: Ding Han^{**}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wo major histories of Chinese Literature have appeared in English: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edited by Victor Mair, an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edited by Kang-I Sun-Chang and Stephen H. Owen. The different organization of these two works is reason to reconsider the periodiz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Whereas many histories of Chinese literature follow a periodization based on dynasties, I will argue that the most fundamental changes in the system of literature, affecting both its production and its consumption, are not due to political changes but to technological changes, such as the invention of paper, the spread of printing, the introduction of modern printing technologies, and our current digital revolution.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nsequences of each of the technological changes will be briefly discussed.

Keyword: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Periodization, Manuscript culture, Woodblock printing, Mechanized printing and lithography.

^{*} Chair professor,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Member of the Royal Netherlands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USA.

^{**} Ph.D candidatur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ingapore.